

# 川大史学

(第二辑)

## 考古学卷

主编 霍巍  
副主编 李映福  
白彬 周静



Historical Studies at Sichuan University  
Collection II: 2006—2016



四川大学出版社

热烈祝贺

四川大学成立 120 周年

## 《川大史学》学术委员会

主任：罗志田

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挺之 石 硕 刘复生 何一民 陈廷湘  
杨天宏 原祖杰 彭裕商 舒大刚 霍 巍

## 《川大史学》工作委员会

组长：霍 巍

副组长：舒大刚（常务）

成员：

李德英 李映福 李志勇 鲍成志 姜 莉

## 前　言

四川大学是我国最早设置考古专业的大学之一（1960年），是中国西南地区唯一具有从考古学与博物馆学本科、硕士到博士、博士后流动站完整人才培养体系的重点综合大学。四川大学考古学科长期坚持以坚实的田野考古为基础，将考古学与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艺术史等学科密切结合，广泛联系文献材料对考古遗存进行综合研究的学术传统，具有雄厚的学科优势和科研实力，在全国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

2006—2016年十年间，四川大学考古学科在已有的基础上，在各方面取得了新的重要进展。尤其是在2011年，考古学从原来从属于历史学的二级学科，升格为与中国史、世界史并列的一级学科，顺利获得考古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批准获建考古学博士后流动站。我们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从各个方面进行建设发展，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根据国内外考古学发展的趋势和时代的要求，在传统考古学科的基础上，大力进行人员结构调整与优化组合，除从本校选留优秀青年教师外，还从英国伦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等海内外名校招聘多名具有博士学位的青年才俊；与此同时，还充分整合了具有百年历史的四川大学博物馆（其前身为建立于1914年的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的教学与科研力量，充实到文化遗产与博物馆

学、文物保护与科技考古、专门考古等学科领域，逐步形成了一支学科布局合理、学缘结构多元、以中青年为主体的充满活力的专业教师队伍，其规模和影响居于中国高校考古学科前列。

学科建设方面，近十年来，四川大学考古学科一方面保持和发扬自身优势与学术传统，在汉唐考古、西南考古（含西藏考古）、道教考古、中国传统考古学史、考古文献学等方面凸显特色，另一方面紧密追踪国际国内考古学发展的新趋势，大力开展石器微痕分析、体质人类学、植物考古、环境考古、冶金考古、文物保护、博物馆学等新兴学科领域。2006年，在学校的重点支持下，通过课程改革、教学资源的优化整合和重组，建成考古学实验教学中心。2008年获准成为四川省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009年成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2012年底顺利通过教育部组织的检查验收，成为全国仅有的4个国家级考古学实验教学中心之一。中心下设考古技术、石器分析、环境考古、植物考古、体质人类学、文物保护、博物馆学7个实验室（动物考古、冶金考古、数字考古3个实验室正在建设中）。新型实验室的建立，新设备和软件的采购，为新型实验课和实验的开设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有力地推动了考古学科的发展。

人才培养方面，近十年来，考古学、博物馆学专业每年面向全国招收本科生约40名，每年招收先秦考古、秦汉至宋元明考古、专门考古（西南考古、美术考古、宗教考古）、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学等四个方向的考古学硕士研究生15~20名，每年招收先秦考古、秦汉至宋元明考古、专门考古（西南考古、美术考古、宗教考古）、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学、文物学与艺术史等五个方向的博士研究生10名。2010年，四川大学成为全国首批获得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之一，从2011年起开始招收考古学研究、博物馆管理与研究、文物学与艺术史三个方向的文博专业硕士研究生。迄今为止，已招收五届文博专硕研究生共约120

人，这些人才主要面向我国西部地区，成为国家布局在我国西南地区的最为重要的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人才培养基地。

田野实践是大学考古学、博物馆学专业办学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尺。2011年至今，我们与有关单位合作，相继在四川、云南、重庆、广西等地挂牌建立了8个考古学、博物馆学实习基地，为高质量的实践实验教学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为配合南水北调、清水江水电站、瀑布沟水电站、向家坝水电站、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一带一路”等国家大型基建工程，近十年来，我专业师生先后赴青海、河南、江苏、四川、贵州、重庆、广西等省（市、自治区），参加考古调查、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与博物馆展陈设计，为我国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专业师生长期在西藏高原及其他藏族地区开展文物考古实践，有关成果为党和国家制定相关政策以及发展规划提供了决策依据，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

与此同时，我们充分利用考古学科的传统优势和地域特色，积极申请和主动承担科研课题，以科研促进教学。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至今，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教师共承担课题68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3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1项），出版考古专著近20部，在SCI、SSCI、CSSCI来源期刊以及国内外其他一流学术期刊共发表论文80余篇，获得省部级奖多项，在国内外均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

在学术交流方面，我专业教师先后赴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以及我国台湾、香港地区出席学术会议、讲学或研修，同时聘请来自美国、丹麦、荷兰等国的学者到我校担任客座教授。我们相继举办了青藏高原史前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7—14世纪青藏高原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四川盆地冶铁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及“历史时期考古青年学者论坛”、“历史时期考古青年沙龙”等学术会议，有力彰显了我校考古学科在

国内外的影响力。2012年，我专业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创办“冯汉骥学术讲座”，每年邀请10名海内外一流的考古学及相关学科学者到我校进行学术讲座。

在成果发布和展示平台方面亦有新的重要进展。2010年，我们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恢复由已故童恩正教授创办的著名学术刊物《南方民族考古》的编辑和出版。截止到2015年底，《南方民族考古》已连续出版了6辑，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影响。同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主办的所刊《藏学学刊》成为发表西藏考古与艺术研究成果的重要学术阵地。2014年，《藏学学刊》成功入选CSSCI来源集刊，其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2006年是四川大学110年校庆，为纪念这一盛事，我们编辑出版了《川大史学·考古学卷》一书，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2016年，又将迎来四川大学120周年华诞。根据历史文化学院的统一安排和部署，我们受命汇集四川大学考古学、博物馆学两个专业的在岗教师2006—2015年间发表的代表性研究成果，编为新一辑《川大史学·考古学卷》，以回顾10年来考古学科的发展历程，展示学科建设成就，以此作为全体考古学人向学校120周年华诞敬献的一份贺礼。根据学院的有关规定，文集收录论文均为作者自荐，每位学者限选一篇独撰或以第一作者身份公开发表过的代表作，因此有若干高水平的论著未能入选，这是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

本书收录论文22篇。根据时代和研究主题的不同，论文内容大体可分为五组：

第一组是先秦考古，涉及辽东地区后洼上层文化的渊源与流向；香港新石器时代斧锛生产系统；古代系绳石刀的类型、年代、分期、分区、起源和系谱；四川广汉三星堆器物坑出土铜器的异同、器物坑的年代与性质；我国早期玉剑具的出现、使用及历史环境。

第二组是秦汉至宋元明考古，涉及我国境内发现的汉代及以前发现的蚀花肉红石髓珠的类型、来源及传播途径、与其他珠饰的关系；“碗式”炼炉的形制、冶炼生成物、冶炼方法及“碗式”炼炉的起源；考古材料所见汉代太一信仰；武德钱文直读、旋读之争及其历史背景。

第三组是专门考古（含美术考古、西南考古、宗教考古），涉及先秦至汉晋时期桑下女图所反映的社会思想和文化观念的变化；四川简阳鬼头山3号石棺画像部分榜题的重新检讨；西南地区东汉六朝钱树衰落原因的分析；吐蕃时期密教五方佛图像的传入及流布；吐蕃系统金银器的特点与风格、制作工艺及其所反映的文化交流；四川地区唐五代时期菩提瑞像变化为毗卢遮那造像所体现的信仰变迁与造像重生；考古发现铭刻材料与《女青鬼律》的成书年代和流行地域问题。

第四组是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涉及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的古代环境；辽宁牛河梁遗址群出土人骨的体质特征、骨骼病理学特征、古DNA分析；西藏史前农作物的发现及其重要意义；粟的作物加工与不成熟粟类作物的鉴定；石质文物的保护等内容。

第五组是文物与博物馆学，以博物馆馆史研究为主，是对传教士在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创建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分析和探讨。

本书的编辑有赖四川大学考古学系、四川大学博物馆各位同事的鼎力协助和支持，尤其是各位作者无偿提供大作。博物馆学教研室主任周静副教授、历史文化（旅游）学院科研秘书姜莉、2013级考古学博士研究生赵川等为本书的编辑和校对付出大量艰辛的努力，并此致谢！

编 者

2016年4月28日

# 目 录

## 后洼上层文化的渊源与流向

——论辽东地区以刻划纹为标识的水洞下层

文化系统 ..... 杜战伟 (1)

## 香港新石器时代斧锛生产系统的重建：以西贡沙下

遗址为例 ..... 吕红亮 (14)

中国古代系绳石刀研究 ..... 罗二虎 (32)

三星堆两座器物坑出土铜器的相关问题研究 ..... 于孟洲 (77)

早期玉剑具研究 ..... 代丽鹃 (93)

中国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研究 ..... 赵德云 (112)

广西平南“碗式”炼炉与我国“碗式”炼炉的起源  
..... 李映福 (136)

汉代太一信仰的图像考古 ..... 王煜 (162)

规范化之争：武德钱文直、旋读并存的新诠释 ..... 黄伟 (202)

## 贞节与春思

——桑下女图考 ..... 陈长虹 (228)

“柱株”及“离利”辨误 ..... 马晓亮 (281)

## 西南地区东汉六朝钱树衰落的社会历史原因浅探

..... 周克林 (288)

吐蕃时期密教五方佛图像的传入及流布考 ..... 杨清凡 (315)

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 ..... 霍巍 (348)

- 从菩提瑞像到毗卢遮那：信仰变迁与造像的重生 ..... 董华锋 (426)
- 试从考古材料看《女青鬼律》的成书年代和流行  
地域 ..... 白 彬 (439)
- 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地层揭示的全新世环境变迁 ..... 李 兰 (474)
- 牛河梁红山文化人群的生物考古学探索 ..... 原海兵 (489)
- 略论考古发现的西藏史前农业作物 ..... 李永宪 (498)
- 不成熟粟、黍的植物考古学意义  
——粟的作物加工实验 ..... 宋吉香 (519)
- Characterization of TEOS/PDMS/HA nanocomposites  
for application as consolidant/hydrophobic products  
on sandstones ..... Luo Yanbing (543)
- 传教士与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的创建 ..... 周蜀蓉 (574)

# 后洼上层文化的渊源与流向

——论辽东地区以刻划纹为标识的水洞下层文化系统

杜战伟\*

辽东地区是指辽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包括辽东半岛及其北部山地地区，就行政区划而言，涵盖了辽宁省的东部和南部及吉林省的东南边缘地带。在该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曾长期分布着以施横线条、短斜线条、人字纹等刻划纹陶器为代表的遗存，在文化性质上分别属于水洞下层文化<sup>①</sup>、后洼上层文化、小珠山中层文化，其发展、消亡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时间。从水洞下层文化、后洼上层文化和小珠山中层文化的陶器亲缘传承关系分析，它们应是同一文化系统（以下简称“水洞下层文化系统”）的不同发展阶段。

水洞下层文化系统的陶器特征鲜明，与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施压印之字纹和附加堆纹的遗存形成明显的差异，它们应属于谱系有别的文化系统。水洞下层文化系统的梳理无疑对辽东地区新石器文化的谱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至今仍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有鉴于此，本文拟从现有材料出发，结合以往的研究成

\* 杜战伟：1985年生，河南沈丘人，2014年获吉林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讲师，研究方向为新石器时代考古，目前研究兴趣侧重于中国边疆地区史前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① 赵宾福、杜战伟：《太子河上游三种新石器文化的辨识——论本溪地区水洞下层文化、偏堡子文化和北沟文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0期。

果，以后洼上层文化源流的探究为切入点，对水洞下层文化系统的发展脉络及其与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做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 一、后洼上层文化的前身是水洞下层文化

后洼上层文化得名于 20 世纪 80 年代发掘的丹东后洼遗址上层遗存<sup>①</sup>。该遗址的下层属于小珠山下层文化的后洼类型<sup>②</sup>。其实，早在 1978 年发掘长海县小珠山遗址和上马石遗址时，即已出土有后洼上层文化性质的侈口刻划纹筒形罐，然而限于条件，发掘者将此类遗存划入了小珠山下层文化的范畴<sup>③</sup>。在后洼遗址发掘后，有些学者根据该遗址提供的层位关系，对 70 年代小珠山、上马石遗址的发掘材料进行了重新检视，指出原认为的小珠

<sup>①</sup> 许玉林、傅仁义、王传普：《辽宁东沟县后洼遗址发掘概要》，《文物》1989年第12期；许玉林：《后洼遗址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1987）》，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3~23页。

<sup>②</sup> 赵宾福、刘伟、杜战伟：《小珠山下层文化新论——辽东半岛含之字纹陶器遗存的整合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论文集（2012）》，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10~128页。

<sup>③</sup> 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长海县文化馆：《长海县广鹿岛大长山岛贝丘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许玉林、许明纲、高美璇：《旅大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和青铜时代文化概述》，东北考古与历史委员会编：《东北考古与历史》第1辑，北京：文物出版社，第23~41页；许玉林：《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文化初探》，苏秉琦编：《考古学文化论集》（2），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96~112页；许明纲：《试论大连地区新石器和青铜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1987）》，第50~66页；许明纲：《大连地区筒形罐谱系研究》，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石家庄·1992）》，北京：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211~216页。

山下层文化包含有与后洼上层文化性质相同的遗存<sup>①</sup>。最近，小珠山遗址的再次发掘<sup>②</sup>，则进一步从层位上印证了后洼上层文化确实是辽东半岛独立存在的一一个发展阶段。

关于庄河北吴屯遗址上层遗存的性质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的认识不尽相同。发掘者最初认为北吴屯上层遗存是介于小珠山下层文化和小珠山中层文化的一种文化类型，将其命名为“北吴屯上层文化”<sup>③</sup>；后又将其纳入小珠山中层文化的范畴，并归入了早期阶段<sup>④</sup>，部分学者亦从此说<sup>⑤</sup>。最近，有学者明确指出北吴屯上层遗存应属于后洼上层文化<sup>⑥</sup>，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并补充提出四点理由：第一，北吴屯上层中少量施压印席纹和之字纹的陶器明显具有小珠山下层文化的特征，应将这部分遗存分离出来，并入到小珠山下层文化。这样一来，不仅更加明确了北吴屯上层遗存的基本特征，而且有助于我们将其与后洼上层文化进行比较。第二，从后洼遗址、北吴屯遗址和 2006—2008

<sup>①</sup> 赵辉：《辽东地区小珠山下、中层文化的再检讨》，《考古与文物》1995 年第 5 期；朱延平：《东北地区南部公元前三千纪初以远的新石器考古学文化编年、谱系及相关问题》，苏秉琦编：《考古学文化论集》(4)，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年，第 84~95 页；赵宾福：《东北石器时代考古》，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289 页。

<sup>②</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长海县小珠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9 年第 5 期。

<sup>③</sup> 许玉林：《试论辽东半岛黄海沿岸新石器文化》，《博物馆研究》1992 年第 2 期。

<sup>④</sup>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庄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大连市北吴屯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 年第 3 期。

<sup>⑤</sup> 刘俊勇：《百年来大连地区考古发现与研究》，《大连文物》，1999 年，第 40~51 页；王嗣洲：《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史前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 年，第 52~62 页；王嗣洲：《大连北三市新石器文化研究》，《北方文物》2000 年第 4 期。

<sup>⑥</sup> 王月前：《鸭绿江右岸地区新石器遗存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纪念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07~126 页。

年小珠山遗址发掘所获得的层位关系来看，后洼上层文化与北吴屯上层遗存的年代均晚于小珠山下层文化，而早于小珠山中层文化，它们具有相同的时间范畴。第三，后洼上层文化的分布范围大体为辽东半岛的黄海沿岸及鸭绿江的下游地区，北吴屯上层遗存也处于这一空间范畴内。第四，两者的陶器组合基本相同，纹饰均以刻划纹为主，种类也没有太大区别。虽然两者存在一些差别，但是我们认为其共性是占主导地位的，它们的差别应是地域性差异的反映。两者部分陶器的形制也极为相似，如北吴屯 T6②C：27 筒形罐（图一，2）与小珠山 78T1⑤：27（图一，1）形态酷似，皆为侈口，斜弧壁，深腹，台状底；北吴屯 T6②C：32 筒形罐（图一，4）窄平沿，斜直壁，浅腹，与后洼ⅡT1②：45（图一，3）形制如出一模。

除上文的后洼遗址上层、1978 年小珠山遗址下层施刻划纹的遗存、2006—2008 年小珠山遗址二期、上马石遗址下层施刻划纹的遗存、北吴屯遗址上层外，东沟县柞木山、石固山<sup>①</sup>，宽甸臭梨隈子<sup>②</sup>等遗址也不同程度地见有后洼上层文化的遗物。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后洼上层文化和小珠山下层文化的后洼类型是前后继承的两种早晚不同时期的遗存。但是，通过对这两种考古学文化出土的遗存进行细致观察和比较后，则不难发现，无论在陶器形制、纹饰，还是器类上，两者均存在明显的差别（图二，左、中）。从目前发表的材料及研究成果来看，后洼上层文化不应是小珠山下层文化后洼类型的继承者，而是由辽东北部山区的水洞下层文化发展而来的。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认识，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sup>①</sup> 丹东市文化局文物普查队：《丹东市东沟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和试掘》，《考古》1984 年第 1 期。

<sup>②</sup> 许玉林、金石柱：《辽宁丹东地区鸭绿江右岸及其支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1986 年第 10 期。

首先从年代上看，后洼遗址、小珠山遗址的层位关系表明后洼上层文化应晚于小珠山下层文化，而早于小珠山中层文化，其年代大约为公元前4000—前3500年，而水洞下层文化处于公元前4000年之前。所以水洞下层文化早于后洼上层文化，两者的年代前后衔接。

其次从陶器来看，无论是在纹饰和器形方面，水洞下层文化和后洼上层文化均存在着明显的承继关系。在纹饰装饰方面，两者皆以刻划纹和戳刺纹为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二者均不见或极少见之字纹。后洼上层文化的刻划横线纹来源于水洞下层文化，且前者较后者稍显凌乱。水洞下层文化的刻划短斜线纹在后洼上层文化中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在北吴屯上层遗存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水洞下层文化陶器流行在口沿素面带下施纹，这一风格在后洼上层文化中也得到很好的继承（图二，中、右）。在陶器形态方面，两者均以筒形罐为主，且筒形罐又可细分为侈口和直口两种类型，各型陶器的递变关系明显（图三，1—4、6、7、9、10）。陶壶也是这两种文化的重要器型，且演变趋势明显，即肩部由端肩发展为鼓肩，颈部由短变长（图三，5、11）。后洼上层文化陶器中普遍存在的台状底，在水洞下层文化也已初露端倪，后者部分陶器的近底处开始稍内收。

综合以上分析，现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后洼上层文化是由水洞下层文化发展而来的。

## 二、后洼上层文化的后裔是小珠山中层文化

小珠山中层文化以1978年发掘的小珠山中层和吴家村遗

存<sup>①</sup>为代表，同类遗存还见于2006—2008年发掘的小珠山三期<sup>②</sup>、旅顺郭家村下层<sup>③</sup>、大潘家村<sup>④</sup>、王家屯、甘井子区文家屯<sup>⑤</sup>、交流岛蛤皮地<sup>⑥</sup>、丹东阎坨子、蜊蚁坨子<sup>⑦</sup>等。

在小珠山中层文化的渊源问题上，主持1978年小珠山遗址发掘的同志认为小珠山下层文化和小珠山中层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继承关系<sup>⑧</sup>。后来有不少学者赞同此观点<sup>⑨</sup>。直到后洼遗址和北吴屯遗址的发掘，才有学者指出小珠山中层文化和小珠山下层

<sup>①</sup> 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长海县文化馆：《长海县广鹿岛大长山岛贝丘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sup>②</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长海县小珠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5期。

<sup>③</sup> 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大连市郭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

<sup>④</sup> 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大连大潘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94年第10期。

<sup>⑤</sup> 刘俊勇、王璇：《辽宁大连市郊区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94年第4期。

<sup>⑥</sup>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瓦房店交流岛原始文化遗址试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92年第1期。

<sup>⑦</sup> 丹东市文化局文物普查队：《丹东市东沟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84年第1期。

<sup>⑧</sup> 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长海县文化馆：《长海县广鹿岛大长山岛贝丘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许玉林、许明纲、高美璇：《旅大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和青铜时代文化概述》，东北考古与历史委员会编：《东北考古与历史》第1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23~41页；许明纲：《长海县贝丘遗址发掘收获》，《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5期；刘俊勇：《辽东半岛南端新石器至早期青铜时代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关系》，《东北史地》2008年第3期。

<sup>⑨</sup> 李恭笃：《辽宁原始文化区系划分与类型研究》，《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安志敏：《辽东史前遗存的文化谱系》，张学海主编：《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济南：齐鲁出版社，1993年，第107~118页；王嗣洲：《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史前研究》，第52~62页；王建华：《试论辽东半岛南部地区的史前文化》，《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别<sup>①</sup>。而小珠山遗址最新的发掘材料则进一步表明小珠山中层文化不仅与小珠山下层文化面貌迥异，两者之间更是存在着明显的时间缺环。

小珠山中层文化的陶器明显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土著文化因素，占主导地位；另一部分则是来自胶东半岛的文化因素，居从属地位。既然小珠山中层文化的性质是由占主导地位的土著文化因素所决定的，探讨其前身自然应该从这部分遗存入手。

从目前发表的材料来看，小珠山中层文化的主体文化因素应该来源于后洼上层文化。在年代上，小珠山遗址的最新发掘揭示出小珠山中层文化遗存与后洼上层文化遗存在层位上相叠压，两者前后衔接。在分布区域上，小珠山中层文化与后洼上层文化的分布范围大体相当，郭家村上层遗存表明前者的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渤海沿岸。在陶器方面，小珠山中层文化不仅继承了后洼上层文化的主要特点，并有进一步的发展。两者的纹饰均以刻划纹为主，小珠山中层文化已经不见后洼上层文化的刻划横线纹，短斜线纹成为后者最主要的纹饰，并且多数陶器的纹饰只占器身的三分之一左右；乳钉纹在后洼上层文化中较为少见，而到了小珠山中层文化，则普遍施于陶器上。小珠山中层文化的筒形罐主要源于后洼上层文化，各型之间递变关系清晰（图三，6—10、12—16）；壶在后洼上层文化中也可找到祖形，器形演变趋势是由鼓肩演变成溜肩，颈部逐渐变长（图三，11、17）。最后，在房址方面，两者皆以圆角方形半地穴式房址为主，而且在房址结构方面，也表现出很大的相似性。

<sup>①</sup> 朱延平：《小珠山下层文化试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考古求知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86～193页；朱延平：《东北地区南部公元前三千纪初以远的新石器考古学文化编年、谱系及相关问题》，苏秉琦编：《考古学文化论集》（4），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84～95页。